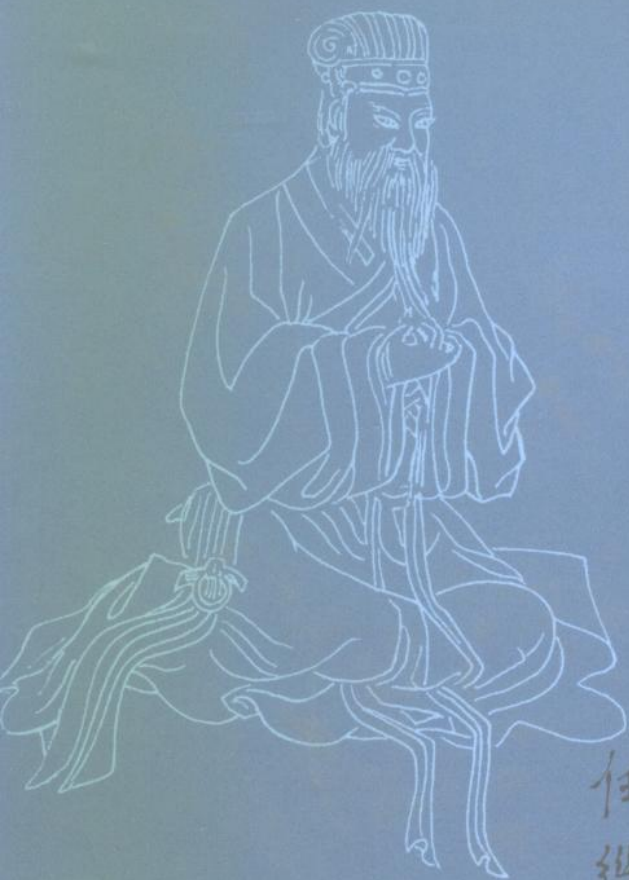


刘鄂培 著

孟子大傳

任繼愈 署簽



刘鄂培 著

孟子大傳

任繼愈 署簽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巨匠孟轲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并进行全面、系统评述的专著。书中对孟子的出身、籍贯及非凡的一生行迹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描述,对其亲属、弟子的情况作了细致交代。书中着重对孟子继承和丰富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以及对“王道”与“仁政”、“民贵君轻”说、道德观、“天命观”、“性善”论、“天人合一”观等进行了阐述,涉及和包括了孟子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历史、教育、美学等方面的重要思想。作者充分吸收了古今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又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角度对孟子思想进行新的阐发;尤其是在提炼、发掘孟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方面,作者付出了心血,这不仅有益于中国的文化建设,而且足以警省世人,予人以启迪。全书以宏富翔实的资料、精审细密的考证和娓娓道来的文笔,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具有可靠性和可读性的孟子生平传记,同时对孟子研究中的诸多悬案及有关疑难问题均提出作者的创见。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大传/刘鄂培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12

ISBN 7-302-02598-3

I. 孟… II. 刘… III. 孟柯-评传 IV. B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818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校内,邮编:100084)

因特网地址: 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3.375 彩色插图:4 字数:346 千字

版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302-02598-3/B·15

印数:0001~3000

定 价:29.80 元

仁民愛物
胞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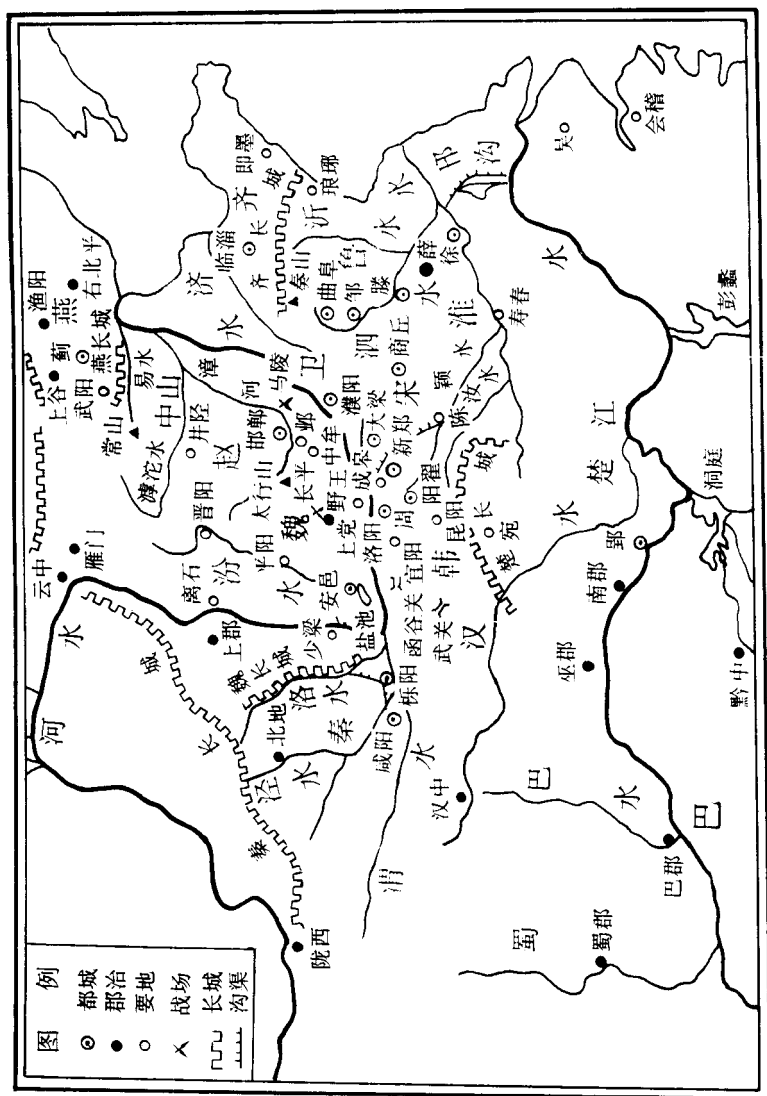
歐陽中石
鄧培教授大著成書題詞

中石



欧阳中石题辞

图形势国战



序

张岱年

D612/01

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之大仅次于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子》七篇，义深辞畅，自汉初以来即为学者所传诵。孟子虽曾受到荀子的批评，但是多数儒者在孟荀两家之中比较推崇孟子。韩愈著《原道》，论儒家之“道”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认为荀子是“择焉而不精”，扬雄是“语焉而不详”，唯孟子可谓孔子的继承者。北宋时代，李觏、司马光等曾著文批评孟子；但是当时在哲学上成就更大的思想家张载、程颢、程颐都大力推崇孟子。南宋理学家中，朱熹、陆九渊立说不同，但都依据孟子立论。至清代，戴震对于朱陆都加以批判，但推崇孟子，所著书题为“孟子字义疏证”。这些情况都不是偶然的。在今天看来，孟子的一些精言粹语仍然是值得服膺的。

我特别推崇孟子的“良贵”学说，所谓良贵，即是人的内在价值。孟子肯定人人都具有良贵，于是提出“生亦我

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阐明了人格尊严的深邃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起了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

孟子是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念的首倡者。他提出“尽心知天”之说，将人的心性与天贯通起来，我在拙著《中国哲学大纲》中称之为“天人相通”论。汉代董仲舒曾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但他所谓“合而为一”指“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实属牵强附会之说。到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程颢则讲“天人本一”、“心便是天”；程颐讲天道人道只是一个道。立说虽然不同，但都来源于孟子。足证孟子学说影响之深巨。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诵读《孟子》的若干章节。

刘鄂培君研究中国哲学史，造诣甚深，对于孟子学说钻研尤深，曾著《孟子选讲》一书，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近又著《孟子大传》，对于孟子的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作了详细的考证与深入的剖析。在孟子生平事迹方面，恪守科学考据的原则，不取“演义”方式；在孟子的思想学说方面，力图发幽辨微，将孟子的精粹思想阐发出来。鄂培君以书稿见示，并邀序于余，于是略述对于孟子的感想，作为序言。

一九九五年七月
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张岱年
导论	1

第 一 篇

第一章 生平述略	35
一 生卒与籍贯	35
二 家世与入仕	46
三 母教与师承	50
第二章 游说诸侯	54
一 问题与焦点	55
二 历程与言行	66
第三章 聚徒讲学	74
一 教学相长	74
二 孟门弟子	77
第四章 《孟子》其书	84
一 作者及著作年代	84
二 外书四篇	90
三 外书四篇的真伪	93
四 清刊本《孟子外书四篇》	103

第 二 篇

第五章	先秦“仁”学体系的奠立及孟子的贡献 ·····	117
一	先秦“天人观”的发展及“重人”思想的形成·····	119
二	中国古代“仁”的发端及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	135
三	孟子对“仁”的学说体系的巨大贡献·····	144
第六章	孟子的“性善论”与“良贵”说 ·····	152
一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端·····	153
二	孟子对人性的界说·····	156
三	孟子的“性善论”·····	162
四	孟子“性善论”的理论意义·····	169
五	孟子的“良贵”说及其意义·····	178
第七章	孟子的“民本”思想 ·····	182
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端·····	182
二	“仁”的学说是“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石·····	187
三	孟子的“王道”政治哲学·····	190
四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和朴素的民主思想·····	196
五	孟子的“仁政”思想和措施·····	201
第八章	孟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和经济学说 ·····	206
一	孟子的国家学说·····	206
二	孟子的社会分工说·····	210
三	孟子的经济分工说·····	216
四	孟子土地改革的蓝图——井田制·····	223
第九章	孟子的道德观及精神境界说 ·····	228
一	孟子的道德起源说和后天的教育、环境 对道德的作用·····	229
二	“反求诸己”——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231
三	“尚公”的道德观·····	234

四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239
五	“浩然之气”、“舍生而取义”:孟子的人生精神境界·····	249
六	“万物皆备于我”:孟子最高的理想精神境界·····	253
七	“生于忧患”:从艰苦磨炼中提高精神境界的方法·····	257
第十章	孟子论心、性、天、命及“天人合一”观 ·····	261
一	孟子论“心”、“性”、“天”、“命”·····	261
二	“天”与“人”·····	263
三	“命”、“天命”与“人为”·····	271
四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概述·····	276
五	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及其特征·····	280
六	古代“天人合一”观的现实意义·····	284
第十一章	孟子的认识论——反映论、可知论 ·····	289
一	“尽信书,不如无书”——重视直接经验·····	290
二	“登泰山而小天下”——统观全局·····	292
三	尚功利的“客观效果论”·····	295
四	重视环境对人的认识的作用·····	297
五	孟子的认识论是可知论·····	299
六	强调思维能动性的反映论·····	304
第十二章	孟子的教育思想 ·····	310
一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311
二	“申之以孝悌之义”——重视道德教化·····	314
三	“仁且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	319
四	孟子的教育方针·····	322
五	孟子的教育方法·····	325
第十三章	孟子的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美学 ·····	331
一	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自然哲学·····	331

二	孟子对“美”的界说·····	336
三	重本质、重意境、重神似——孟子对中国 传统美学之影响·····	343
四	“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大化流行” 宇宙观及其对中国绘画“透视法”的影响·····	349

第 三 篇

第十四章	孔孟对中国文化的主要理论贡献·····	357
一	“仁”——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	357
二	“和”——莫立了重“和”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	368
三	“公”——创立了“尚公”的社会学说·····	376
第十五章	中国文化及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展望·····	380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	380
二	中西文化传统各有短长·····	382
三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之争·····	394
四	新的时代及新的文化观·····	402
后记·····		407
附 孟子生平行迹年表		

导 论

孟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社会经济学家。他生于公元前 372 年（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 289 年（周赧王二十六年），享年 84 岁。孟子是邹国人，这在两汉时已有定论。

在春秋末战国之初，孔子首创了儒家学说。至战国前期，孟子继承于孔子，并宏扬儒家学说，使之在理论上、体系上更臻完善、系统化。后儒称之为孔孟之学，孔孟同为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奠基人。

一 孟子生平及《孟子》一书

（一）孟子的生卒年代

两汉期间，关于孟子生平的文献有司马迁的《史记·孟荀列传》和赵岐的《孟子题辞》。这是今日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但是，其文辞过于简略，连孟子的生卒年月亦未明载。因此，这个问题成为研究孟子生平的一个难点。

在历史上最早记载孟子生卒年的有：

（一）《孟氏家谱》 这部家谱的作者姓名不详，应为孟子后裔。该书出现的年代，据本书考证约在宋末元初（见本书第一章后文）。《孟氏家谱》断定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有误，周定王无三

十七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年—前289年),寿八十四。

(二)《孟子年谱》作者为元中叶的程复心。该年谱断定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372年—前289年),寿八十四。

我们发现,在上述两书中有共同之处,即孟子的卒年均在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程复心的《孟子年谱》实际上是以孟子卒年为基准点,按孟子寿八十四的传说,上溯84年而得出孟子的生年。由于程复心之说,与《孟子》一书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孟子一生所接触的历史人物都基本相符,因此获得清代大多数学者的赞同。清同治四年(1865年),孟子的70代孙孟广均在重修《孟子世家谱》(现藏山东邹城市文物管理局)时,纠正了宋末元初《孟氏家谱》中关于孟子生年的错误,对孟子的生卒年,完全采纳了程氏《孟子年谱》所说。可见程氏之说在清代影响之深广。

程氏《孟子年谱》中有关孟子生卒年之说,应是对成书于宋末元初《孟氏家谱》的修正。两书中都将孟子卒年定为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但是,两书的作者都未指明出自何种历史文献资料。因此,程氏之说在清代虽已广为学者们赞同,但仍有文献根据不足之虞。

(三)清代魏源编有《孟子年表》,他说:“《史记·索隐》谓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阙里志》(为明朝陈镐作)从之。”(《古微堂外集》)按引文的文义,魏源在编《孟子年表》时,已见到过《史记·索隐》中关于孟子卒年的记载;而且在魏氏之前,明陈镐也见到过,否则魏源不会言“《阙里志》从之”。由此可见,宋末元初以来将孟子卒年定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是有文献根据的,这个根据应是《史记·索隐》。可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在流行于今世的《史记·索隐》中不见有关孟子卒年的记载。其可能性有二:一是魏源捏造文献资料;二是魏源所见到的《史记·索隐》,是不同于今世流行本的另一个版本。我们认为,如果魏源为了证实孟子卒年

这一小事而捏造文献,不惜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欺世盗名的骂名,从魏源当时在学术、政治上的地位来说,他是不必也不会这样做的。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因此,魏源应是见到过《史记·索隐》中关于孟子卒年的文献的,不过,它是不同于今世流行的另一个版本。遗憾的是,在魏源之后这个版本已佚失。

魏源的话应是可信的,他为程复心关于孟子生卒年之说提供了文献根据。因此,本书在孟子生年、卒年上沿用程氏之说。

(二) 游说诸侯

关于孟子“游说诸侯”问题,在清代争论颇多,归纳起来,主要争论有:(一)孟子“游说诸侯”从哪年开始,何时结束?(二)是先至齐,还是先至梁?(三)是一次至齐,还是两次至齐?这几个问题是研究孟子生平的又一个难点。

本书解决的方法,是从《孟子》一书中所涉及到的几个重大的、关键的历史事件入手,先从历史年代上予以定位,随之,清代学者所讨论的上述三个争论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我们认为,需定位的关键历史事件有四:

一是梁惠王在位年数与卒年。二是马陵之战等三个战役的具体年代。三是魏惠王从安邑徙都大梁和“相王”的具体年代。四是齐伐燕的具体年代。

这四个关键历史事件的年代定位,是解决孟子“游说诸侯”这段历史的焦点,所以本书又称之为四个“焦点”。

这四个“焦点”的历史年代的定位,其先决条件要有一个准确的战国纪年。《史记·六国年表》以及《魏世家》、《齐世家》、《燕世家》等在纪事上虽详尽,但在纪年上失误颇多。如梁惠王在位年数与卒年就有重大失误。《史记·六国年表》载:魏(梁)惠王在位 36 年卒(前 335 年),子襄王立,改元为魏襄王元年。但是按《竹书纪年》:魏惠王在位 36 年改元为“后元”,后元 17 年卒(前 319 年),子

襄王立。魏惠王改元前后共在位应为 52 年。而《史记·六国年表》误将魏惠王改元当作魏惠王卒，将魏惠王之卒和子襄王之立提前了 17 年。《竹书纪年》原书在晋太康二年，出土于魏襄王（一说魏懿王）墓，因此《竹书纪年》应是战国时期魏人记的魏国史。所以其中的战国史（尤其是魏史）的纪年应是比较可信的。因此，本书对孟子“游说诸侯”这一时期历史的确定，根据有三：（一）以《竹书纪年》为主；（二）以《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魏、齐、燕等《世家》的纪年为辅；（三）同时参照《孟子》一书。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原书于两宋时已佚，仅部分资料保存于酈道元《水经注》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中。近人王国维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为本书的纪年提供了主要依据。

前文所述有待定位的四个“焦点”中的前三个，关系到孟子“游说诸侯”是先至梁或先至齐及何时至梁等问题：

一）梁惠王在位的年数和卒年

前文已述，《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有误，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梁惠王在位 52 年，应卒于前 319 年，次年（前 318 年）子襄王立。据《孟子》一书记载：孟子在梁见到了梁惠王和梁襄王，而且在梁时间不长。因此，本书将孟子至梁定于前 319 年，是时孟子 54 岁。这与梁惠王尊称孟子为“叟”（老丈）亦相符合。

二）马陵等三个战役的具体年代

孟子在梁时，梁惠王有“东败于齐”之语，此指齐田忌败魏于马陵之事，按《竹书纪年》应在前 341 年，周显王二十八年；又“南辱于楚”，按《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周显王四十五年（前 324 年），楚败我（魏）襄陵”，即指此役；又“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梁惠王语均见《孟子·梁惠王上》），按《史记》记载，秦伐魏前后共有五次，最后一次是“秦取魏曲沃、平”，《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定于周慎靓王元年（前 320 年），这是“西丧地于秦”的下限。梁惠王在梁国时与孟子谈及上述这三个战役，这足以证明孟子至梁不可能在此三个战役之

前,而必定是在这三个战役之后。上文据《竹书纪年》,已将上述三个战役的时间分别定于前 341 年、前 324 年、前 320 年,都发生在孟子至梁(前 319 年)见梁惠王之前。这与孟子于前 319 年至梁,见到梁惠王之事相符合。

三) 魏惠王从安邑徙都大梁和“相王”的具体年代

据《水经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前 365 年,周显王四年)徙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按旧说,梁惠王徙都大梁是为强大的西秦所迫。此说实误。梁惠王所说的“西丧地于秦”,是在徙都数十年之后的事。在徙都之前,魏国列于“七雄”之强。又据《六国年表》:“魏襄王元年(《六国年表》误,实为梁惠王后元元年,即前 335 年),与诸侯会徐州以‘相王’。”所谓“相王”,旧说是子襄王追谥其父为惠王,此说亦误。“相王”是梁惠王自称为王,并改元为后元元年。由上可见,梁惠王徙都和“相王”的真实目的在于取得中原有利条件以称霸于中国。自“相王”之后,梁惠王励精图治,延揽人才。这就是孟子适梁的原因。

《孟子》一书记载,孟子在齐时对公孙丑说:“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孟子于前 332 年,齐威王二十五年,孟子 40 岁时已至齐。若干年之后,离齐至宋,过薛、邹、鲁而至滕;前 319 年,梁惠王末年,孟子又离滕来到梁。依上所说,孟子“游说诸侯”的历程是先齐(威王时)后梁(惠王、襄王时)。

孟子离梁之后何往? 是一次至齐,还是两次至齐? 请看第四个“焦点”。

四) 齐伐燕的具体年代

齐国伐燕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前 332 年。按《史记·燕世家》:“易王初立,齐宣王(《燕世家》误,燕易王元年,应为齐威王二十五年,前 332 年)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第二次在前 314 年,齐宣王七年。按《史记·燕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周赧王元年(前 314 年),燕子之杀公子平不克,齐师杀子

之，醢其身。”

在《孟子》书中亦有两则记载：一，《梁惠王下》云：“齐人伐燕，胜之。宣王（应为威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指取燕城），或谓寡人取之。……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齐取得燕城之后，引起诸侯不满，谋伐齐以救燕，齐王又问孟子：“诸侯将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劝告齐王：“王速出令，反其旄倪（释放被俘燕人中之老弱者），止其重器（停止掠夺燕之财富），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尊重燕民意，立燕君而后撤离燕国），则犹可及止也。”齐王迫于形势，听取了孟子意见，归还燕城。这与《史记·燕世家》“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基本相同。足见《梁惠王下》所记的是前332年，齐威王二十五年的第一次齐伐燕。二，《公孙丑下》云：“沈同（齐臣）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这一记载与《史记·燕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周赧王元年（前314年，齐宣王七年），燕子之杀公子平不克，齐师杀子之，醢其身”一致。足见《公孙丑下》的记载为前314年，齐宣王七年，燕哙王七年，齐第二次伐燕。

齐国两次伐燕（齐威王二十五年、齐宣王七年）孟子都在齐。此足以证明：孟子“游说诸侯”是先至齐，正是齐威王在位之时。离齐之后至宋，再经薛、邹、鲁至滕，由滕而至梁。离梁后，第二次回到齐，正是齐宣王在位之时。孟子“游说诸侯”的历程，从他40岁（前333年，齐威王二十四年）至齐开始，到64岁（前309年，齐宣王十二年）离齐返邹为止，总共25年。近人钱穆先生考证：“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先秦诸子系年·孟子在齐威王时已先游齐考》）本书对孟子“游说诸侯”历程的推断，与钱穆先生的考证基本吻合。

此外，在本书编定孟子“游说诸侯”的历程时，我们发现在以前